

论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

王敬平

(焦作教育学院 河南焦作 454001)

摘要:容闳是“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人,他积极倡导“教育救国”,主张教育西化,最早组织幼童赴美留学,筹办新式教育,被誉为近代“留学生之父”。

关键词:容闳;教育救国;西学东渐

近代西学东渐,铸就了中国无数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奋斗终身,容闳就是其中一员。他一生热衷于沟通中西文化,推行“西学东渐”,积极倡导“教育救国”,“籍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最早组织幼童赴美留学,积极筹办新式教育,充分体现了容闳教育救国的思想和一腔爱国热情。

一、容闳的“教育救国”信念的形成

容闳从小家境贫寒,1835年进传教士郭实腊夫人所办的小学学习,1840年11月1日转入马礼逊学堂,注册名字为“亚闳”。1847年,容闳与同在马礼逊学堂毕业的黄胜、黄宽一同至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日后毕业于耶鲁大学。但就在容闳决定留美继续深造时,经济上却毫无支助,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学校规定学生保证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方才授予。容闳谢绝了老师们的安排。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也。他日竟学,无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2]这充分表达了容闳报效国家的坚强决心。大学时代的生活无疑对容闳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有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同时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社会进步、新科学、新知识也深深触动了容闳,使他萌生了西学可以救国,教育能使国家强大的信念。他说:“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可以说,容闳较早地意识到了教育与知识,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最早地认识到了西学新知的价值和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容闳把西学与

救国强国联系在一起,认定只有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培养有用人才,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对此容闳有过十分清楚的表白:“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4]在当时普遍轻视西方,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对西方物质文明嗤之以鼻的中国,无疑是比较先进的。

容闳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更于他亲眼目睹东西方巨大差异,中国的贫穷落后有关。他曾痛切地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心。”[5]面对外国人的横行霸道,他曾深有感触地讲:“自从在上海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之后,在其管辖区内从未听说过任何中国人当他们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侮辱时,敢于毫不畏缩地挺身保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到来。”[6]

总之,容闳青少年时期在国内清贫艰难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留美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及其所见所闻,使容闳深刻认识到东西方的巨大差距。强烈的爱国心使容闳的内心深处铸就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教育救国,教育使民族强大。

二、容闳“教育救国”计划的设想

作为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新式高级知识分子的容闳,眼界开阔,知识广博,思想深刻,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表现出高度兴趣和强烈的追求。

(一)中国教育应该西化

在容闳的心目中,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化,中国的教育

收稿日期:2001-01-09

作者简介:王敬平(1964-),女,河南博爱人,焦作教育学院政史系讲师,主要从事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研究。

首先应该西化。因为西式教育既可以传播新知,又可以造就健康的人格,孕育新的思想,所以容闳始终坚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教育思想,认为这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当然容闳所说的“西方学术”实际上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而主要指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主要受他个人的经历及爱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受教会教育的影响,特别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修养和意志力方面的磨炼。他曾引用大教育家阿那博士的话来表明心迹:“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7]所以,容闳始终强调西化式的教育。他认为西式教育可以传播新知,造就健康的人格,孕育新的思想。

(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基于西式教育可以救国的信念,容闳积极倡导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他认为中国进行国际交流,指挥海陆军队,管理海关,都需要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才;要培养人才,就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这一设想体现在他请丁日昌代呈的四项建议之中的第二项,即“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可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8]

(三)兴办新式教育。具体体现在他给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的七项建议之中:“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设立各科实验学校。”[9]这一建议虽未得到进一步落实,但充分体现了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1860年容闳抱着某种幻想到太平天国的中心南京,其目的是寻找可以依靠或借助的力量来实现自己“西学东渐”计划,结果失败。容闳说:“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不变计”[10]可见容闳举办新式教育的计划没能得以实现。

三、容闳“教育救国”计划的实施

1854年,刚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为了实现他夙怀梦牵的“教育计划”,匆匆返回故国。在他看来:“予之生于斯也,既非为哺喂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11]为了实现其“教育计划”,

容闳多方奔走,既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又结交中国权贵,不敢稍怠。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各级官吏的昏庸,容闳的努力均未成功,他并不灰心,继续努力。为了寻求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曾国藩对此事的帮助,容闳不惜为曾赴美购买办“洋务”的机器,终于赢得曾的赞许。在曾国藩领衔上奏后,1871年8月,清廷采纳容闳派遣留美学生建议,容闳为之苦心孤诣、奔走呼号十六年之久的“教育计划”终于如愿以偿。

按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120名幼童将分四批奔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幼童30名,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赴美,为了帮助幼童更好地学习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此间容闳亲任留学事务所的副监督,他对留学事务尽心竭力,整日东奔西走。但是,清政府朝令夕改,听信谗言,使容闳苦心经营的教育计划于1881年被迫流产,四批学生全部召回,除詹天佑等二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外,其余学生均未完成自己的学业,其中有60名尚在中学肄业。[12]

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虽然未能按他所设想的予以实现,但毕竟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沉闷,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而且这批留学生回国后,逐渐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物,或者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据粗略统计,这批留学生后来在中国从事海洋和航运业的有28人,其中有做过江南造船厂厂长的邝国光,还有9人任军舰舰长;从事铁路工作的有16人,其中有建设京张铁路而享盛名的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电报工作的18人是中国办电报系统的主力,其中3人任电信局长;从事矿务的8人,是中国第一批采矿工程师,其中有把开平矿务局建成中国最大煤矿企业,在八国联军侵略时期奋力保护矿产不被外人侵犯的吴仰曾,有山西临城、同宝等煤矿总经理工程师邝荣光;从事教育工作的4人,其中有后来的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和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从事外交与洋务的31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梁诚、刘玉麟、蔡廷干等(分别任过外交总长、内阁部长、次长等);从事金融业的9人,其中有上海商储银行董事唐元湛,上海华商银行行长钟文耀,江海关监督关仲贤等人;此外在医务、新闻界也有一些知名人士。[13]在这些人当中,虽然也不乏反动官僚政客,但大多数人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生力军。从这个方面来讲,容闳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2][3][4][5][7][8][9][10][11]容闳.西学东渐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65,58—59,61—62,67,61,56,121—122,94,99—100,118.
- [6]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回忆录[M].中华书局,1951.43.
- [12][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0,180—181.